

文匯講堂

传播人文关怀 汇聚高端名流 讲得通俗易懂 堂中尽情交流

2013年6月30日 总第63期

文匯网:www.whb.cn 邮箱:whjt@wxjt.com.cn

公告栏

扫描二维码,关注文匯讲堂微信公众号、加入文匯讲堂读者俱乐部。不仅将获得每期讲座信息,更有主题摄影、参观访问、新媒体训练营等活动邀您参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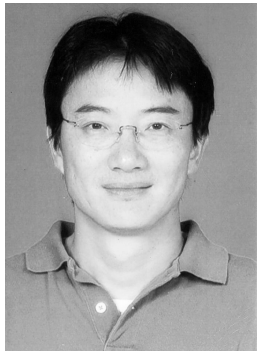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匯讲堂
微信公众号账号



文匯讲堂
读者俱乐部

经典阅读在全球化时代的大学



张旭东
主讲嘉宾

1965年生于北京,现任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、东亚学系教授、北京大学中文系“教育部‘长江学者’讲座”教授、北大-华东师大-东京大学-纽约大学联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。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1995年获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学位。

研究方向包括文艺批判、文艺理论、政治哲学和现代中国文化等,聚焦于中国语境之下/之外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,涉及文学研究、当代批评理论和政治哲学等诸多领域。

他用英文和汉语写作;英语的有《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》、《后社会主义和文化政治》等专著,《中国向何处去》、《后现代主义与中国》等编著。中文则有《批评的痕迹》、《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》等专著,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》、《启迪》、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》等译著。



陈思和
对话嘉宾

1954年生于上海,原籍广东番禺。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,留校任教。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,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、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文艺学会副会长。

研究方向包括中国二十世纪文学、中外文学关系、当代文学批评等,主要研究范围包括巴金研究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、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等诸多领域。

代表著作有:《巴金研究的回顾和瞻望》、《中国新文学整体观》、《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》、《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》、《秋里拾叶录》、《巴金论稿》(与李辉合著)、《人格的发展——巴金传》、《黑水斋漫笔》等。并主编“火凤凰”文库、“逼近世纪末”书系以及“世纪回眸人物”系列等。另有编年体文集出版。

中国人需要新的民族性

今天的中国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根基。在建立中国认同上有许多误区,以为是要搞国学热。其实,今天的中国人再奢谈传统文化,其实是在消费传统文化,是“啃老”。今天的中国人需要在实践中产生出新的民族性,即使一开始是贪婪、自私狡诈的负面形象,但这是可以转变的一个环节。

(摘自2011年7月观察者网专访)

中国的本土不是地域概念

西方每次遇到精神危机还到基督教、古希腊传统中去寻求解决。而中国的问题也得从本土传统中寻求答案。但我们对本土传统不能做一个狭义的理解,本土包含很多层面,孔孟之道、60年社会主义建设、30年改革开放都是本土。中国有意思的地方在于,本土不是地域概念,而是时间概念。本土是不断在时间中生发出新的东西的能力、意志和想像力。

(摘自2008年6月6日《东方早报》专访)

中国物质发展的背后有什么?

在全球化的今天,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赶上了,融进去了,成了当代的“世界工厂”;但偏偏在根本的价值和认同问题上“空洞化”、“泡沫化”。其中的原因当然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,但其中之一也许就是整个社会领域的“非政治化”和庸俗经济学化。

我们不必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,但我们不能不问自己,在物质生活的地表之下,我们有什么样的“时间的种子”在生长、发芽。

(摘自2002年10月4日《文汇报》)

鲁迅不仅仅属于中国

鲁迅是国际现代主义运动的一个环节。不仅仅要把他看做属于中国的一个思想家、文学家、革命家,而是把他放在同诸如俄国现代主义、日本的现代主义、北欧、东欧的现代主义写作这样一个世界文学的脉络里面来重新审视。这样鲁迅必然会成为二十世纪早期的一个现代主义大师,一个经典文学文本,被重新引入世界文学的典范当中。

(摘自《生活在后美国时代》(孙晓忠编)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2年)

中国的博士教育 缺少总体性问题的意识

从形式规范上讲,中国人文学科的博士教育并不比国外同行的差。但问题在于,我们没有总体性问题的意识,所以局部做得再好,严格说来都是一个不成形的东西。而西方的学术再小、做得再局部,总是有整体性问题的意识和学术发展的框架支撑在后面。这需要我们思考,如何去寻找现实问题和学术问题的交叉点,找“国学”和“西学”相通的地方。

(摘自北大课堂讲稿《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》)

(本版整理 谢怡华)

为什么还要阅读经典?

——卡尔维诺与布鲁姆的回答

编者按:

伊塔洛·卡尔维诺 (Italo Calvino, 1923-1985),意大利新闻工作者、短篇小说家、作家,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小说家之一。代表作有小说《分成两半的子爵》、《意大利童话故事》、《树上的男爵》等,他的文论《新千年文学备忘录》是80年代风靡全球的畅销书。

哈罗德·布鲁姆 (Harold Bloom, 1930-),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、“耶鲁学派”批评家、文学理论家。曾执教于耶鲁大学、哈佛大学等高校。主要研究领域为诗歌批评、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。代表作有《影响的焦虑》、《J书》、《西方正典》、《如何读,为什么读》等。

从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理论家的不同角度,卡尔维诺和布鲁姆都试图为经典辩护,并开出了西方经典的书单,勾勒出西方文学史的脉络,值得读者学习。

经典在当代的危机

卡尔维诺曾经写了一本畅销书——《新千年文学备忘录》。书中,他表达了他对即将到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,文化文字可能受到的冲击表达了深深的忧虑,唯恐今后文化将变得单一,而语言文字将失去深度,人类将变得机械化。

写作该书时,是1985年,网络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,经济全球化还没有真正成为现实。卡尔维诺害怕人类将遗忘经典,于是他开出了一份可以用于未来千年的文学史教材,历数从古希腊直至当代的经典作品。

而20多年后的今天,卡尔维诺所担心的事情似乎已经成为了现实。经济的全球化已毋庸讳言,人类也越来越习惯于网络时代的“读图文化”、“快餐文化”,留给阅读经典的时间越来越

少了。即便退回到学院内,阅读经典似乎也走上了一条越来越狭隘的,偏离人文主义的“专业化”道路。

“现今大学里的教学已被政治化了;我们不再有大学,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……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十字军运动所代替,如后殖民主义、多元文化主义、族裔研究,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。”布鲁姆他在的代表作《西方正典》的中文版序言里如是说。

在现代社会陷入虚无主义,文字文化显著衰退,人文大学沦为“媒体大学”的今天,经典阅读已岌岌可危。

关于经典在当代的命运,英国批评家柯莫德在《关注的形式》中提出了警告:

经典,它不但取消了知识和意见的界限,而且成了永久的传承工具;不过,经典无法对抗理性,也就当然能被解构。如果人们对经典不以为然,他们也可以设法摧毁它。虽然很难看到学术机构,包括招生机构,可以抛弃经典而正常运行,但捍卫经典再也不能由中心体制的力量来进行,也不能由必修课来延续。

阅读经典的理由

卡尔维诺还写作了《为什么读经典》,来回答这当代社会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。但是面对这一棘手难题,他也只能迂回地答道:“我还真的应该第三次重写这篇文章,免得人们相信之所以一定要读经典是因为它有某种用途。唯一可以列举出来讨他们欢心的理由是,读经典总比不读好。”

布鲁姆也认为,所谓阅读经典能够促进美德或社会秩序之类的口号都是虚假的。他提出,“要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”,才能真正将读者引向恢复读书。阅读的必要性在于为了自己

的利益。在《如何读,为什么读》一书中,他提出了阅读的五条原则:

首先,阅读的乐趣是自私的,而不是社会的。他之所以转向阅读,是出于一种孤独的习惯,而不是作为一项教育事业。专业读书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公共利益,但真正能够引发乐趣的,仍然是孤独的读者,他为了自己而读,而不是为了假定的超越自我的公共利益而读。

第二,没有阅读的伦理学,不要试图通过读书来改善他人。通过阅读进行自我改善已经是个足够庞大的计划,应当充分利用时间用自己的内心之光来阅读,洗净自己的无知。

第三,他借用了爱默生的话:“一个学者是一根蜡烛,所有人的爱和愿望会点燃它。”作为读者的发展尽管是自私的,但所起到的效果却是公共的。如果你变成一个真正的读者,那么你的努力所起到的效果会证实,自己将变成别人的启迪。

第四,仍然来自爱默生,“要善于读书,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发明者”。这意味着,要有“创造性阅读”,而这建立在“自我信任”的基础上。这种自我信任并不是靠着天赋,而是经过多年深读后才能得到的。阅读时在追求一颗比我们自己心灵更原创的心灵,尽管我们未必自知。

第五,寻回反讽。文学中反讽尽管往往是带着时代特征的,但一旦失去,文学也缺少了想象力。反讽也要求专注度,以及维持对立的观念,所以,剔除反讽意味着阅读失去所有的准则和惊奇。反讽会清楚空头理论家的虚伪套话,帮助读者像蜡烛似的学者那样燃烧起来。

经典之为经典

在布鲁姆看来,我们或许能为自

己找到很多理由来阅读,比如我们需要认识自我,需要认识别人,需要认识人性,甚至是需要认识事物本质,但是抛开所有这些形而上学的概念,最强烈、最真实的动机仍然在于读者自身的乐趣。

但寻找这种乐趣并不容易,需要读者的求索。需要我们调动全身心地超越边界,用人性去解读。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将莎士比亚的崇高地位解释为殖民主义的兴起,我们也很容易就用弗洛伊德主义学说,以双性恋的角度去解构莎士比亚。这样的解读似乎正成为大学教育的主流,但如此专业化的阅读违背了阅读的乐趣,甚至违背了大学教育的初衷。人拥有的远远不止是某一种意识形态、或民族背景,而是广阔得多的天性,只有天性才能与经典之间真正地贴近。

阅读不是理想主义,而是实用主义;不是集体主义,而是个人主义。布鲁姆和卡尔维诺的回答也许都多少有些虚无主义,不过却在根本上是反诸自身。而归根到底,经典的形成既不是由批评家和学术界决定,更不是由政治家决定的,而是经典的作者本身决定的。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就经典的秘诀,在于他们的普遍性,而不是他们体现了女性主义、历史主义或心理主义的意识形态。经典超越阶级、种族、性别和国家利益的界限。

推荐书目:

卡尔维诺《新千年文学备忘录》,黄灿然/译,译林出版社,2009年
卡尔维诺《为什么读经典》,黄灿然/译,译林出版社,2006年
布鲁姆《西方正典》,江亢康/译,译林出版社,2011年
布鲁姆《如何读,为什么读》,黄灿然/译,译林出版社,2011年